



陈林

董其昌是明朝山水画家，其画论独到精辟。他曾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鄠鄂。”大意是，一个人通过多读书多游历，去芜存菁，山川走势、天地架构自然就了然于心了。这虽然谈的是作画技法，其实也是为学之道。此次赴山东临沂开展体验式教学，所思所悟，正应了这句古话。

最初的感悟，来自临沂东夷文化博物馆之行。走出博物馆，我心中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逻辑，完全变了。一直以为，以中原为中心，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化外之地，趋附之，拱卫之。如今看来，东夷，就其文明进化而言，当与中原并驾齐驱。若论及以东夷文化为主体、交融中原文化而成的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更是举足轻重。

我们熟悉的很多传说故事，与东夷有关。例如，开百王之先的太昊、统百鸟之尊的少昊、战神蚩尤、孝帝大舜、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东夷文化分布范围极广，北起辽东半岛，南至苏北淮北，东起山东半岛最东端，西至河南东部。今天的临沂市及其周边，是其核心区域之一。所谓蒙山沂水，琅琊故地，也指这一带。

蒙山古称“东蒙”“东山”，地处临沂市西北部，总面积1125平方公里，为山东第一大山。主峰龟蒙顶仅次于泰山主峰玉皇顶，乃山东第二高峰，素称“亚岱”。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蒙山东北方的沂山，有“大海东来第一山”之称。沂蒙山区水流丰沛，主要河流为沂河和沭河，纵贯临沂全境，形成脉状水系，计有大小河流1800余条。如此山水形势，恰与《易经》六十四卦之“蒙卦”吻合：蒙卦上艮下坎，艮为山，坎为水，而山下有水之貌，正是千峰耸峙，万壑争流，山重水复，云雾腾腾之境。

在这片大山大水孕育的土地上，齐鲁文化与楚文化燦然交汇，底蕴厚重，名人辈出，自古养成了大气派，锻造了大格局。《诗经》鲁颂篇有云：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

继东夷文化、齐鲁文化之后，琅琊郡的历史和传说，成为这片土地上文明发展的又一高峰。电视剧《琅琊榜》的热播，使世人只知琅琊，不知临沂。秦设郡县制，凡三十六郡，琅琊为其一。东汉改琅琊郡为琅郡国，建都开阳城，即今临沂市区。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千年以降，盛名之下，自成气象。琅琊之名，始终与神秘、豪侠、仁义、浪漫相伴随，文武兼备、风云天下。

然而，神秘光环的另一面，是贫

瘠的土地和艰难的民生。沂蒙山区大小山头近7000座，其中有一种由流水侵蚀而成的“桌状山”远近闻名。此山造型独特，顶部平展开阔，周围峭壁如削，放眼望去，酷似一座座高山城堡。当地称之为“崮”，素有沂蒙七十二崮之说。大巧若拙，雄伟峻拔，有审美之趣，却无耕作价值。并且，层峦叠嶂，沟壑纵横，以致“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长此以往，存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沂蒙山区，固然是埋兵布阵的好去处，却到底是一片穷山。

山难，水亦难。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曾有著名的“五害之说”：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恶雹霜，一害也；疠，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清代诗人屈复写过一首排律《神水行》，描述1730年沂沭河大水灾，其情其状，令人震撼，亦令人唏嘘。

治理齐鲁水患，兴利除弊，历朝历代皆有为之。然而真正改天换地、一劳永逸者，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发起的导沭整沂工程：劈开马陵山，挖通新沭河，疏浚大沂水，彻底根治鲁南和苏北的水患。渡江战役硝烟未散，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水利工程就开始了。整个工程历时5年，先后动民工114万人次、技术工人4500人。工地绵延数百里，战酷暑，斗严寒，龙腾虎跃。因治水而成就就业者，虽大禹李冰，比之导沭整沂，亦不过九牛一毛。

百万中华儿女在沂沭河战天斗地之际，正值百万志愿军将士鏖战朝鲜半岛。那是怎样一个热血沸腾的激情年代！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受到这种激情感染，毅然放下手头的创作，抱病前往导沭整沂工地体验生活，暂用画笔书写千年不遇的劳动场面，创作现代版的《愚公移山》。他为治水英雄讴歌：“模范同志们，你们英勇创造出来的纪录可与我们在前方抗美援朝战士们英勇光辉的战功同垂不朽，因为他们正在消灭猛兽，你们消灭洪水，洪水猛兽为害人类是一样的，我国古人常相提并论的。”

导沭整沂肇其始，兴修水利继其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接续整治，沂沭河流域已有各类水利设施9万余处，形成了以“大水源”为依托、“大水网”为骨架，河库串联、多源互补的水网体系。以河为轴，两岸开发，八水灵秀润沂城。今日临沂，已然是一方以水为魂的美丽家园，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沂蒙大地上。

与开山导水形成呼应的，是守山护林。一动一静，相得益彰。千里蒙山，山深林密，昔日交通之大弊，却成今日生态之大利。蒙山迄今仍是一

片原生态处女地，森林覆盖率98%以上，曾被中科院监测到空气负氧离子含量220万个单位/立方厘米，创我国最高纪录，被誉为超洁净地区。继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之后，蒙山亦被评为全国首座中国生态名山，是举世公认的养生胜地。

当然，让蒙山沂水闻名于世的，绝非山穷水恶，亦非水秀山青，而是近代中国的一场风云际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队、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在这里布下一局三方大棋，大开大合，波诡云谲。而国共两党的博弈，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最终，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党政军机关都驻扎在沂蒙山区。毛泽东非常重视山东的战略地位，他说：“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历史最终选择了共产党，首先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毛泽东坐镇延安，布局全国。他曾经说过，山东换了一个罗荣桓，山东的棋就走活了。山东的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那么，罗荣桓是怎么走的这步棋呢？最根本的是重视群众工作。他对沂蒙根据地的干部讲：“有了群众，就有了粮食，有了战场，有了兵源，就一定能够由弱变强，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陈毅说得更直率：“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人民，他们用小米养育了革命，用小推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柳亚子游昆明湖。柳亚子问毛泽东，共产党何以短短3年就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用了什么锦囊妙计。毛泽东回答：人民群众是最大的锦囊妙计。

这个锦囊妙计能否有效，取决于两点：一是人民群众的取态，他们必须跟你走；二是人民群众要组织起来，一盘散沙是没有战斗力的。共产党的组织动员力有多强呢？据统计，沂蒙根据地总人口不过420万，竟有20万人参军，120万人支前，10万人为国捐躯。提供支前小車32万辆，担架61万付。做军鞋15万双，军衣122万件，碾米磨面11716万斤。救护伤病员6万人，掩护抗日军政人员9万人。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这哪里是国共双方军队在打？它分明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或者说，人民群众自己在跟国民党军队作战，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当乡亲们喊出“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口号，这场仗尚

未打开，胜负已定。

1947年初夏，国共双方在蒙山沂水大棋局中下了一着胜负手——孟良崮战役。退守孟良崮的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四师，全副美式装备，为甲等装备师，是蒋介石的五大王牌师之一。师长张灵甫血性十足，自视甚高，舍身配合蒋介石的决战计划：以七十四师为“磨心”，调遣十个整编师增援，形成绞杀大磨，围歼解放军华野主力。

小时候看《南征北战》，以张灵甫为原型的张军长，恶狠狠地说出“不成功，便成仁”的那副形象，迄今记忆深刻。想当年，孟良崮上，欲立不世之功的张灵甫，力拔山兮气盖世，无奈士气不振，援军不速。率部3万余人，近2万人成了俘虏。十路援军在蒋介石、顾祝同再三严令下，最近的一路推进到距孟良崮5公里处，炮弹已能打到孟良崮，但终未能解救张灵甫于重围之中。

其实，在这场风云际会中跌落的，何止骄矜的张灵甫。看蒋介石本人，崛起于离乱之世，掉落于混沌之局，亦是一代枭雄。而且，他还提倡新生活运动，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律己不可谓不严。但若在大格局上输了，终不免被历史淘汰，为百姓万众所抛弃。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德英，大山里一个普通的聋哑农妇，因这场风云际会而名垂史册。她用自己的乳汁，滋养了一位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千千万万的沂蒙红嫂，则用自己的乳汁，滋养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她们催生了新中国，并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这就是大格局。

往事如烟，数不尽天地沧桑，道不完人间真情。且填《满江红》一首，为蒙山沂水大写意——

万里龟蒙，琅琊地、怅然寥廓。想当初、东夷先祖，宁开荒拓。太昊一呼丘壑应，舜虞百孝黎民和。到而今、玉带绕珠城，江天阔。

沧桑事，弹指过。求解放，从来迫。看南征北战，漫天烽火。岗上神威社稷定，村头鱼水亲欢乐。枉灵甫、趁几许风流，归零落。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一班学员，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青年工作部部长〕



由“楚王失弓”说境界

人，得弓的也是人，何必计较是不是楚国人呢？”在孔子的心目中，楚人与天下人一样，都是平等的“人”，也道出了儒家“仁者爱人”的境界。

而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老子听到孔子的说法后，说：“把人也去掉更好啊。”这就成了“失弓，得弓”。在老子看来，人与天地万物也是一样的，都是造化 and 自然的平等产物，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得与失的关系，其“天人合一”的境界无疑又高了一层。

境界之高下，在于能否摒弃“物”的限制。境界体现一个人的人格胸襟、政治眼光和战略视阈，需要摒弃身份地位、物质条件、个人喜好等外界因素的制约。楚王的境界在于摒弃了楚王与楚人的限制，孔子的境界在于摒弃了楚人与天下人的限制，而老子的境界在于摒弃了人与自然的

限制，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境界带来的思想格局。漫画家丰子恺曾说：人生应该有三层楼，底楼住物质，二楼住精神，三楼住灵魂。一个人要提升自己的境界，就需要放大自己的格局，放下名、利、权、色等身外之“物”的困扰，尽力往“楼”上走：在精神信仰上登高，在道德修养上超越，在利益诉求上等闲，在大爱情怀上跨界，境界就会豁然为之一扩。

境界之高下，也在于能否破除“空”的困惑。针对楚王失弓，明《竹窗随笔》中称：楚王固沧海之胸襟，而仲尼实乾坤之度量也，却还“不能忘情于弓”。这且不够，因为还“不能忘情于我”，连求所谓“我”都不可得，又如何求“弓、人、楚”呢？这道出了四大皆空的境界。应指出的是，境界是不可能虚空于社会而存在，它不仅仅是一种人生修养，也是一种改造主观世

界和客观世界的精神力量。我们所说的境界是积极能动的境界，而非消极避世的境界，类似于四大皆空、看破红尘，与世无争、无所作为的思想和做法实则无益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也无益于人的健康成长。

境界之高下，还在于能否破除“私”的羁绊。说到底，境界是一个人的心态问题，更是立场问题，有着鲜明的价值观属性。如果凡事淡公利己、私心居上，斤斤计较、毫厘必争，难免跌入俗境，思想也会自我矮化，停留在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功利境界”；而心系百姓、克己奉公，胸怀大爱、造福人类，则境界堪称高矣。工作生活中也是如此，心中有国家，眼里有大局，胸怀有他人，跳出“小我”看问题，仰望星空干事业，思想和精神境界将为人钦佩。

“楚王失弓”，后人不应失境界之追求！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情与国情相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我们从理论上认识和在整体上把握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进入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文学工作者特别要对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工作重要讲话中提到的“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等论述，有机而内在地联系起来去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同时，要切实深入生活现实，扎根人民之中，阅读当下社会，把握时代脉动，要在文学创作中，以切实的探索和扎实的成果予以应有的回应。

在文艺创作领域，作品的题材类型不胜枚举，但现实题材尤其重要；现实题材中可写的也不一而足，但写出改革开放这一“中华民族新史诗”更为紧要。

现实题材之所以重要，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理由，最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伟大的新时代及其带来的社会生活变化和人们的心理变动，需要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去反映和描述。通过作家艺术家个人的深切感受、作品呈现的精彩故事，书写这个时代的新气象，塑造这个时代的新人物，传扬这个时代的新精神。二是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作为“剧中人”和“剧作者”，需要通过紧贴时代的脉动，反映时代沸腾生活的优秀作品，来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反观时代中的自己。在这个意义上，现实题材作品具有时代镜像的功能与作用。三是文艺是一定时代的文艺，这个时代的文艺一定要打上属于这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并在“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用于回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实现与生活的密切互动，保持与时代的紧密联系，并不断焕发出自身的生力、活力与魅力。

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更为紧要，是因为“新史诗”在题材题材旨上具有天然自在的重大性。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面对这种震古烁今的史诗性变化，无动于衷，是严重的失职；无能为力，是显见的失责。所以，写出“中华新史诗”，既是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需要，也是作家的职责。

书写“新史诗”，向作家艺术家提出了更多高的要求，那就是要走出对于生活零碎的印象、对于时代肤浅的感受，要在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上去思考和升华个人生活、个人经验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抓取和思索重大问题，处理和把握重大现象，以具有生活广度、精神厚度和艺术力度的优秀作品，捕捉时代脉息、记录时代变革，同时体现这个时代的文艺的美学气度与作家的艺术风格。

与“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的要求相比，我们的文艺创作确实差距甚大，需要加深反思。改革开放40年来，从人们看得见的社会日常生活，到看不见的心理世界，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种从经济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的历史性变迁，的确给当代的文艺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素材与写作契机。从理论上讲，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孕育文艺精品的大时代。但从实际上看，我们却没有取得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艺成果。即以文坛内外最为关注

新时代呼唤『新史诗』

白桦

的长篇小说来看，现在每年的长篇小说总产量都在1万部左右。在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近两年的许多长篇小说，都表现出直面新的现实，讲述新的生活故事的审美取向。但认真检视起来，却不难发现，多样化的写作中，旨在反映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而深刻的时代变迁，以及这种社会巨变带来的人们心理撞击与精神新变的作品还并不多见；而着力于典型人物形象的精心打造，尤其是写出既有独特的个性又有凛然的正气，葆有新的时代气息和精神气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还显得相当薄弱。

一时难于出现书写“新史诗”的力作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文艺家对这种一直在不断变动中的生活现实，既需要近距离的细致观察，又需要艺术性的整体把握，这不仅要求很高，而且难度极大。它对作家的要求，除了有精准地把握现实的能力与精湛的艺术表达能力外，还最好具有由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知识融合在一起构成的文化厚度、思想深度，以及用这种特有的素质打量生活、处理素材、提炼意蕴的非凡功力。用这样的标尺去衡量我们的作家，无疑还有较大的差距，确实还需要好好蓄精养锐，进而奋发蹈厉。

文艺的生命力，既在于植根于生活，又在于作用于时代。文艺自身的这种规律性要求，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以及在其他重要讲话中要求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宣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是有着内在的契合的。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自我，又要超越自我，把“小我”融入“大我”，把时代使命内化为自己的文学情愫与艺术追求，真正使自己的文艺写作接地气、有生气、扬正气，感知人民声息，感应时代脉搏，纵情抒写“新史诗”，放声歌唱新时代。

